

21世纪大学文科教材  
博学·史学系列

L I S H I Z H E X U E Y I N L U N

# 历史哲学引论

(增订本)

张耕华◎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博學·史學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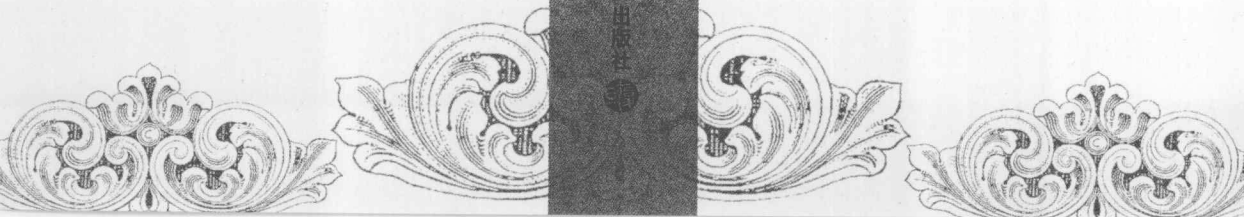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度规划基金项目《历史学的元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



# 历史哲学引论

张耕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张耕华著.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309-06902-0

I. 历… II. 张… III. 历史哲学-研究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4485号

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

张耕华 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史立丽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刷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5  
字数 323千  
版次 2009年10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4 101—7 200

---

书号 ISBN 978-7-309-06902-0/K·263

定价 2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容简介

LISHIZHIXUEYINLUN

当我们问“物理学是不是一种科学”，实际的问题是：以这种研究逻辑来研究物理世界所获得的知识是否可称之为科学。然而，当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设问历史学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历史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科，它几乎涉及我们大部分的认知形式和知识品种，如史实的确认、史事的理解、历史的理论概括、历史意义的评价等。这些不同的认知形式，生产不同的知识产品，体现不同的认知属性。本书将历史认识活动划分成不同的层面，剖析其不同的认识形式和知识属性，以便完整地理解历史学的本质特性。而历史知识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本书应讨论的问题。



# 序言——历史与理论

何兆武

当代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习惯于“低头拉车”而不习惯于“抬头看路”。这里假设的前提仿佛是说：结论是早已经摆好在那里的了，历史学家的任务，无非就是为它再一次地补充上一份例证而已。你能填充一项例证，就算是作出了一分成绩，你能补充两份例证，就算是作出了两分成绩。正有如诸葛大丞相在“空城计”中的名言：“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这种为学的态度乃是经学的态度，《圣经》里面每提到一桩事件时，往往总是要强调“这就应了经上的话”云云。原来真理早在经上都有了，人们所见证的事实无非是为经上的真理再一次地提供一个例证而已。历来经学家的神圣职责无非就在于代圣贤立言、弘扬经义，而绝不可以对经义本身加以反思乃至拷问。然而真正的科学或哲学则恰是要对历来的经义不断地加以反思、质疑和拷问。实验、数据、资料 and 思想理论，双方永远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的。

如果学术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不仅只是要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那么学者就不应该单纯局限于找材料来充实自己的观点，而应该同时不断地反思并批判自己所据以立论的根据。这里的“批判”一词是指它 18 世纪的原义，即学者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经历一番逻辑的洗练或自我批评，借以检验自己立论的可实证性(或可证伪性)。任何学术思想，凡是不经过一番批判的洗礼的，都只能是一种经学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论证。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是通过一套伦理道德的教诲所传承下来的，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知识去寻求真理，而是以事例进行说教，引导人们更好地去实践某种伦理价值(如忠君、爱国)。一直要到 20 世纪

之初,史学界才开始自觉地开展一场史学革命,即所谓“新史学”的出现。新史学的登场对于传统的经学说教,确实有一番摧陷廓清之功,使人们的思想认识焕然一新,不再拘守在陈腐的说教束缚之下。到了五四时期,新的历史学已经从传统的政治伦理说教之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学术有其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它不再单纯是神学说教的女仆,为某种流俗的利益服务。但是五四运动在其理论方面也不免有局限。当时的学术思想大抵是在西方19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大气候之下进行的,而以历史学尤甚。它力图把历史学拉到朴素的事实的面层上来,但事实本身却并不构成其为历史学。历史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实证的,尽管它不排斥自己有实证的一方面,然而归根到底,它在其本性上并不就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也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实证的范围之内。证据或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乃是掌握了这些材料的人。

自然科学的研究以自然世界为其对象,自然世界本身是客观的,研究者设定它是没有思想、意志或感情的,所以并不用考虑其间有任何的人文动机。然而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人文世界,它彻头彻尾贯穿着人们的思想、意志和感情。故而历史的研究方式就不可能简单地等同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方式,尽管它也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某些操作方式,如对某些古物的成分与年代的鉴定,为某些社会现象建立数量化模型等等。人们总是习惯于说:事实就证明了什么什么。但是事实本身并不能进行论证,进行证明的乃是使用这些材料的人。而任何人都是为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所制约着的,因此就没有通常意义上那种所谓的客观。即使是人人都有目共睹的,也并不就意味着客观。例如,彩虹是人人看到的,但它并没有客观存在。自然现象尚且如此,人文现象就更加微妙得多了。历史就其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不可能不是与自然世界的必然律相一致的这一方面而言,它是不会脱离或者是违反自然世界的,故而也要服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但是人文世界是人的创造,而不是(或不单纯是)自然的创作,或者借用一位哲学家的话来说:历史乃是自由人所创造的自由的事业。因而它就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或者,我们不妨使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历史的轨迹是在这样一个坐标上运行的,这个坐标系的两个轴,一个代表着物质世界的必然,另一个则代表着人文精神的自由创造。因此,历史本身的运动轨迹就具有两重性,它是受这两者共同制约的结果。或者也可以把历史比作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它的走向乃是这一平行四边形两边合力的结果。所以历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要探讨历史

行程之必然的、不以人的精神作用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但同时另一方面就要探讨历史行程之中那些非必然的人文动机的作用。因而，不但历史本身有其两重性，历史学本身也有其两重性。于是，这里就是一阙两个两重性的“两重奏”。未能够明确地理解这一点，正是导致以往大多数历史学家在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上未达一致的原因。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无思想意识的自然界（有人认为原子也有自由意志，另当别论），所以它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则恰是人文动机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历史，人文世界本身乃是人文动机在起作用的产物。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客体抑或是研究的主体，都彻头彻尾地在贯穿着人的意志和愿望。既然人的主体性始终贯穿于其间，所以它就始终是受着人的意志的影响的。在这种意义上——而不仅仅是在“事在人为”的意义上——它同时也就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任何学术总是材料与理论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结合而发展的。理论不可能毫无事实的根据，对事实的理解也必然促进理论不断深入。双方都不可能在原点上停滞不动。我们今天的认识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之前我们那些前辈了。当然，我们也还是站在他们肩上才超越了他们的。过去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习惯于旧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探讨方式，往往满足于沉浸在成堆的史料和现成给定的思想体系之中，而从不萦心于自己所由以出发的思想的前提假设的条件及其局限性（或者说，它的有效性范围的界限）。这种盲目往往会导致人们钻之愈深则失之愈远。史家在自己对待历史世界的态度上，也必须既是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即既须入乎其内深入探索史实的真相，同时又能出乎其外随时反思并批判自己是如何理解历史世界的，亦即它的有效性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正如一位航海家在大海之中是要时时刻刻调整着自己的方向的，而并非是罗盘一旦定了向，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永远勇往直前了。一项史实是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的，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却是永远在不断深入和永远不断在改变着的，从而我们对它的解读（也就是我们的思想）也是不断在改变和更新的。没有丰富的资料发掘作为依据，我们对历史的理念就会是空洞的，而没有深刻的自我反思，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是盲目的、武断的。这一点对于许多传统的实践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是一件言之匪艰、行之维艰的事。一种学术风尚一旦形成了一种舆论的气候，虽有豪杰之士往往也难以从其中脱身，更谈不到要力挽狂澜了。不过对这一点也不必过于消极。一方面，一个时代的大潮固然是个人

所难以抗拒的;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要看到事在人为。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学是历史学家所创造的。颜习斋不是就说过吗:“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以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理性不是不可以战胜盲从的,批判不是不可以战胜信仰的。这就又回到了上述的两重论:历史创造人,人也在创造历史。历史学家就是在这样一阙“两重奏”之中不断前进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人文科学近年来也呈现出某些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思路。史学思想和理论正在经历着一番更深层次的新的反思,尤其是有一批中青年的专业历史学家正在从事于历史理论与历史学理论更深层次的探讨。人们常常要问:人生有什么意义?史家也往往要问:历史有什么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那意义也不是客观世界先天给定的,而是要待到人们探索之后才给定的。这便是通常所谓的历史哲学。凡是未能对此作出答案的,可以说都未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对历史本身作出答案的,可以说是历史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对历史学本身作出答案的,则是历史哲学中的认识论。以中国悠久的历史学中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及操作方法相结合,我们可以期待着我国历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不先批判地认识历史学本身的性质,又怎么可能认识历史呢?

华东师大张耕华先生最近以他多年钻研的心得撰成《历史哲学引论》一书,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历史学的本性及其认识论的问题。承耕华先生不弃,于书成之后赐寄一份给我,使我先睹为快。我深恐未能很好地体会作者的原意,遂拉杂写出自己读后的随感如上,以就教于耕华先生和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道。

2004年9月  
北京 清华园



# 引 言

哲学家利科曾说：“在最近的 20 年中没有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像历史学那样在其本身方法论方面进行了如此彻底的再思考。”<sup>①</sup>利科的这一番话，针对的是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西方史学理论界的一般状况，借用利科的话来概括又一个近 20 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上的变化，倒也是合适和贴切的。只是史学理论研究上的一些变化，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的影响，似乎是微乎其微的。理论研究者与一般学者之间难以交流沟通，恐怕是中外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的历史学者认为，史学理论的这种研究，有故弄玄虚之嫌，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甚至是人为地把问题复杂化。而理论学者则像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所表达的那样：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还没能走出康德所说的“教条式的昏睡”，他们没能意识到自己学科里的问题<sup>②</sup>。这种沟通、交流上的隔阂，就中国史学界而言，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好像也未见得有什么改观。

本书所要讨论的是有关历史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的问题。不过，这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因为讨论历史学的问题，总是会牵连到许多历史的问题；反之，讨论历史的问题，也总是会碰到有关史学的问题。比如我们讨论历史学的规律理论，它的前提就是历史本身存在着规律，如果历史没有规律，那么我们的规律理论及体系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样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历史哲学”。但是，有关历史的理论探讨与有关史学的理论探讨，毕竟不是一回事，在具体的

---

① 利科著，李幼蒸译：《哲学主要趋势》，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240 页。

② 雷蒙·阿隆著，冯学俊、吴泓缈译：《论治史》，三联书店，2003 年，第 29～30 页。

研讨中,仍有进一步区分的必要。所以,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最先提出了一对新术语:把讨论历史理论问题的,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把讨论史学理论问题的,称之为“批判的历史哲学”<sup>①</sup>。前者是指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学者的研究,后者是指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学者的研究。20世纪以后,亨佩尔、威廉·德雷、海登·怀特等学者虽然也是以史学理论为研讨对象,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与狄尔泰等学者有所不同。为了加以区别,又出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一词,用来专指历史哲学向“语言学”转向后形成的一种研究路数。不过,习惯上我们常常将这两者统称为“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本书的讨论大体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当。虽然沃尔什的划分为后来的学术界所接受并沿用,但“历史哲学”这一术语已经为大家熟悉和习用,如沃尔什的著作虽然讨论史学问题,而书名仍称《历史哲学——导论》,威廉·德雷的著作也题名为《历史哲学》。

在中国史学理论界,相关的名称术语还未统一。有关前者的,有“历史的形而上学”、“历史本体论”、“史学本体论”、“历史的哲学”、“历史理论”等;有关后者的,有“历史学的知识论”、“历史学的哲学”、“历史认识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理论”等。其中,“历史认识论”一词,使用得较为广泛。

“历史认识论”,顾名思义,就是有关历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它的最终成果,就是一种史学观。“历史认识论”也可以表示理论研究的特殊视角,即以认识论的方式来研讨史学问题,这实在也反映了近30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实际。就笔者所见材料来看,采取认识论的视角来研讨史学问题,主要是中国和前苏联学者的研究路数,而西方学者大多是采用科学哲学的视角。这两种研究路数,各有千秋,也各有利弊。科学哲学的问题意识突出,论域清晰。只是按照笔者的理解,历史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科,它几乎囊括了我们所有的认知形式和知识品种,如史实的确认、史事的理解、历史规律的概括、历史意义的评价等。这些不同的认知形式生产不同的知识产品,体现不同的学科属性。所以,历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并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史学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也不可相提并论。前者比后者所涉及的问题更多,也更复杂。从这个意义

---

<sup>①</sup> 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8、18页。有关“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区分,可参见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95页。

上说,科学哲学的视角还是不够的。在西方学术界,参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史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等,他们不仅研讨史学的方法、逻辑,还考察史学的表述工具和形式,这似乎表明史学哲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般认识的研讨范围,而需要有一种广义的历史认识论来处理这许多问题,尤其是要对学科的不同层次、不同知识产品及其性质特征分别加以研讨。在这一点上,雷蒙·阿隆的批评是合理的,他认为英美分析哲学家过于看重史学的叙事形式,就会把历史理论局限于叙事理论,结果很多属于历史认识范畴的成分就会被我们排斥在外<sup>①</sup>。然而,过于局限于传统的认识论模式,也常常会忽视对历史学科的本质特性的探讨,这也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主要缺陷。

虽然笔者在此领域已有过一番思索和研究,但能够见之于文字的,只能说是一种看法或意见。1874年,德国哲学家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问世,这是一本被视为开“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先河的著作。作者在序言中说:“我这些想法为什么要终于刊行出来,那原因就是我愿意并且希望着,它们会协助一些更有能力的人们一劳永逸地清理和处理一个应该加以处理的题材。”<sup>②</sup>这一领域的问题,能否有可能一劳永逸地清理完成?这是让人颇感怀疑的事,至少笔者不敢有这样的奢望。以笔者的知识和能力,所能做的工作只是:整理问题,梳理逻辑,找出症结,作点解释,其间也包含一些个人的理解——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看法或意见。其作用大概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便利和门径<sup>③</sup>,故取名为《历史哲学引论》。

著 者

① 雷蒙·阿隆:《论治史》,第186~187页。

② 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9页。

③ 本书作为初学者的一种门径和阶梯,有必要让读者了解本领域的学术争论及争论双方的一些基本观点,为此,本书在正文或注文中,引录了许多学者的有关论述以及一些精彩的论断,引文尽可能直录原书,并注明出处或来源,读者按图索骥,可以进一步阅读这一领域里的许多经典著作和论文。

# 目 录

---

## CONTENTS

序言——历史与理论(何兆武) / 1

引言 / 1

### 一、史学是什么? / 1

1. 质疑与批评 / 1
2. 历史学的科学化 / 5
3. 彻底的批判与反思 / 8
4. 史学理论研究的起步 / 11
5. “史学概论”, 概论什么? / 14
6. “历史认识论”的兴起 / 17
7. 何、鹿之分歧 / 19
8. 元问题及其研讨路径 / 21

### 二、史实与史家 / 25

1. 历史学的“月亮问题” / 25
2. 事实能否自己说话? / 28
3. 以事实为中心的史学理念 / 31
4. 事实与非事实 / 33
5. 史实与史家的关联性 / 36
6. 谁决定了历史的意义 / 39
7. 三种历史事实 / 42

8. 历史事实的类型 / 44
9. 普通事实的量化问题 / 47

### 三、历史的真实 / 52

1. 历史学的分层 / 52
2.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 55
3. 认知图式与双向建构 / 58
4. 对符合说的诘难 / 62
5. 一种弱化的检验 / 65
6. 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观 / 68
7. 历史个别的非同一性 / 70
8. 历史学有没有“范型” / 73
9. 事实能否说得清? / 76

### 四、理解与解释 / 81

1. 什么是历史学Ⅱ? / 81
2. 移情与体验 / 83
3. 历史的“真了解” / 86
4. 理解的差异 / 88
5. 覆盖定律及其他 / 90
6. “why”和“how” / 93
7. 文本的权威消失了? / 95
8. 硬性与软性 / 99
9. 史家的“弹性” / 103

### 五、叙事与想象 / 107

1. 叙事问题 / 107
2. 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 111
3. 历史就是虚构? / 114

4. 建构与解构 / 117
5. “大屠杀”问题 / 120
6. 历史学家的想象 / 123
7. 小说的真实性 / 126
8. 推理与证据 / 129
9. “反事实”的想象 / 132

## 六、历史的重演 / 137

1. 科学的尺度 / 137
2. 个别论与借用论 / 140
3. 分歧与症结 / 142
4. 什么是重演? / 144
5. 相似与同类 / 147
6. 历史的相似与重演 / 149
7. 澄清一种误解 / 151
8. 从因果性到因果律 / 153
9. 几种不同的必然性 / 155
10. 历史能否预言? / 157

## 七、因果关系与理论命题 / 162

1. 何为历史学的原因? / 162
2. 复杂化与简约化 / 164
3. 理论陈述的非清晰性 / 167
4. “相干性”问题 / 170
5. 测不准和不确定 / 173
6. 概率问题 / 176
7. 历史学的概括 / 179
8. 理有概然, 势无必至 / 182

## 八、历史学的人文性 / 185

1. 史学要不要评价? / 185

2. 从柯林武德的一段话说起 / 189
3. 历史需要不断地重写 / 191
4. 历学哲学的特殊问题 / 194
5. 配景论与不可通约性 / 196
6. 客观性不等于真理性 / 199
7. 人文界的“实然”与“应然” / 202
8. “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毁灭”? / 205
9. 寻找普世的评价标准 / 206
10. 是法理思维,还是科学思维? / 208

## 九、历史之用的特殊性 / 210

1. 历史有什么用? / 210
2. 记忆的自然作用 / 212
3. 遗忘也是生活所必需 / 215
4. 求真第一,还是致用优先? / 217
5. 不论真假,都有效用 / 219
6. 历史之用的虚拟性 / 222
7. 历史该怎么用? / 224
8. 史学的异化和社会良心 / 227
9. 历史学家的责任 / 229
10. 如何遏制历史之滥用 / 231

## 基本读本和参考书目 / 235

## 后记 / 244

## 再版后记 / 249

# 一、史学是什么？

## 1. 质疑与批评

说来奇怪，还没有哪一门学科的研究，会像历史学那样，存在着那么多的分歧、怀疑和批评。这里所说的分歧、怀疑和批评，不是指具体的历史问题的争论，而是对历史学科性质的质疑。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历史学能够向我们提供怎样的知识产品，是单称判断（如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如淝水之战发生在公元 383 年），还是普遍性命题（如我们以前一直所相信的那样，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知识产品，就是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sup>①</sup>）；历史学所提供的这些知识是否真实可靠？是否具有客观性？怎么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或客观性？第二，即便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知识确实可靠，并具有客观真实性，那么，这样的知识有什么用？——历史知识有什么用？任何一门学科以及它的研究，如果在这样两个基本的问题上遭到他人的怀疑或否定，就等于是怀疑或否定了这门学科的合法性。

不过，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并不太在意这些疑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或理所当然的事情。自从分析历史哲学兴起之后，前辈学者的乐观主义和称心如意才彻底地被搅乱，这两个问题不仅变得严峻，而且难以回答、难以回避。

---

<sup>①</sup> 关于普遍性命题与历史学科的性质，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国内史学界通常的看法是：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她始终未能发展成为科学。只是在科学的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历史学才发生了伟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出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参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史学”、“历史科学”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第227、92页。



今天,每一位从事这一行当的研究者都会碰到这一类疑问:当历史学家正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一大堆历史事实时,门外汉向历史学家所提的唯一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马尔奎斯·杜·查特理特(Émilie du Châtelet, 1706—1949)曾对历史知识感到困惑,她说:

一大堆混乱的无联系的事实,一千个关于不带任何决定性的战争的叙述。一个和我一样的法国妇女有什么必要知道在瑞典埃格利继承了哈奎恩和奥托曼是奥托古尔的儿子?①

而这一类历史知识,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还不断地在与时俱增。在今天,马尔奎斯还可以进一步质问:为什么她要操心关于17世纪英国妇女生育率的一大堆资料?为什么她要关心现代美国炼钢工人以及诸如维多利亚资产阶级的家具、法国军队新兵中的痛风病的发病率等历史问题和知识?而这些问题,以及有关这些问题的历史知识在专业的历史著作中比比皆是。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是让历史学者犯难的问题,即便是终身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历史学家,恐怕对此也未必能说出个究竟来,或者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1945)那样,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②。我们可以无视门外汉的质疑,说那是出于对历史学的无知和误解;我们也可以说卡尔·贝克尔在发一时之感叹,是对世人忽视历史经验教训所表示的一种愤慨(的确,贝克尔并非真的认为历史无用)。但是,这里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如果你越是深入去思考、越是对历史学有过一番真切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你越是会陷入一种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

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它是不是一门科学,抑或它只是一种艺术。这些在其他学科里不会有的问题,或者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历史学中却充满了疑问与分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有一句名言:在哲学上不首先去探讨认识的本质和能力,而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就好像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那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深受康德影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将康德的这一观念变为他反思史学的宗旨: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对自己的了解,那么,他对历史的了解总是不完备的。柯林武德说,他的主要工作在于使史学界认识到:

对历史科学进行哲学的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

① 转引自恩斯特·布莱萨赫:《历史、历史学和史学史》,《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

② 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